利用第一原理探討鍺(錫)與二氧化鍺或二氧化鉿等高介電材料之介面特性

電子所碩士班研究生黃敬琮

指導教授:李峻霣助理教授

一、簡介

自 1970 年代至今,隨著電晶體尺寸不斷縮小,矽的 CMOS 元件已漸漸達到 其物理極限,使用新的材料來取代矽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許多材料被提出來 製作未來的 CMOS 元件,其中, 鍺被大家極為看好,因為其 mobility 比矽大, 且鍺跟矽同為四族元素, 製程上可與過去幾十年來成熟的矽製程技術相容。此外, 鍺錫被預測比純鍺有更高的 mobility, 且錫同樣為四族元素,因此, 鍺錫能否運 用來做金氧半元件的材料也備受關住。

然而, 鍺(錫)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並沒有二氧化矽之於矽那樣好的介電質材料, 鍺與氧化鍺等高介電係數材料的介面存在許多缺陷, 而鍺錫與介電層的介面至今 仍很少被人探討。半導體與氧化層的介面缺陷直接影響到元件的電學特性。因此, 如何減少這些缺陷就成為鍺(錫)能否成功取代矽, 成為未來半導體產業最重要的 材料的關鍵。

本實驗室希望透過 Materials Studio 中的模組 CASTEP,利用第一原理密度 泛函理論,研究鍺(錫)與高介電係數材料的介面模型,希望能找出不同的介面模 型對於材料特性的影響。進一步,希望能把由第一原理得到的結果輸入 TCAD 來模擬鍺元件的電學特性,同時進行相關實驗,將模擬結果與實驗量測結果進行 比較。

二、目前進展

在模擬鍺(錫)與 GeO₂、HfO₂、ZrO₂等高介電係數材料的介面之前,我們先 模擬純鍺與鍺錫的 band structure。目的是要確認此工具用於模擬鍺錫結構的正確 性,藉由透過 CASTEP 來進行第一原理密度泛函理論的計算。圖 1(a)(b)為純鍺 的 conventional cell 與 primitive cell 結構,純鍺的 space group 為 227 FD-3M;晶 格常數取實驗值 5.658 Å。我們使用 DFT(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計算 band structure 時選用的 functional 是 GGA (Generalized Gradient Approximation)中的 RPBE (Revised Perdew-Burke-Ernzerhof)。針對鍺的 primitive cell 結構進行運算, 充分利用鍺晶格的對稱性來降低運算時間與運算量。計算 band structure 前,我 們先把待模擬之結構進行 Geometry optimization,調整晶格常數與角度使系統的 能量降到最低。



圖 1 (a) 鍺的 conventional cell 結構,內含八顆鍺原子 (b) 鍺的 primitive cell 結構,內含兩顆鍺原子

計算出來的結果如圖 2 所示, 鍺的能隙是零且為直接能隙的材料, 很明顯與 實驗值不符。看了一些論文後, 我們得知在使用 DFT 時, functional 選擇 GGA 與 LDA (Local Density Approximation) 雖然會得到不錯的 band structure 之形狀, 卻經常會低估能隙的大小。因此, 有人提出 GGA+U和 LDA+U 的方法, 透過加 入一個參數(Hubbard parameter, U), 可以有效改善模擬結果。在加入 U 之後, 我 們得到的結果如圖 3, 鍺的能隙被打開了, 且 band structure 之形狀更為正確。其 中,我們的 U 值選定為 s= 0 eV, p= 1.15 eV, d= 0 eV, f= 0 eV。然而, 所得到的能 隙還是稍小, 因此, 我們加入 scissors operator。scissors operator 可以把 conduction band 往上平移。我們針對 Γ band (000)的能隙選定 scissors operator 的大小, 把 Γ band (000)的能隙調到跟實驗值 0.8 eV 一樣, 結果如圖 4。其中, 黑色的線是由 EPM (Empirical Pseudopotential Method)得到的結果[1], 與我們由 DFT 得到的結 果相當接近。



圖 2 鍺經由 DFT 計算出的 band structure, functional 為 GGA 中的 RPBE。在計算前結構有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

CASTEP Band Structure



圖 3 鍺經由 GGA(RPBE)+U 計算出的 band structure, U 採用 s= 0 eV, p= 1.15 eV, d= 0 eV, f= 0 eV。在計算前結構有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



圖 4 鍺經由 GGA(RPBE)+U 計算出的 band structure, U 採用 s= 0 eV, p= 1.15 eV, d= 0 eV, f= 0 eV。Scissors = 0.361 eV。在計算前結構有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

在得到與EPM相近的結果之後,我們還調整了不同的Hubbard parameter U, 並分別給予不同的 scissors operator 使得計算出的 band structure 在 Γ band (000) 的能隙皆與實驗值 0.8 eV 相同。此外,我們也針對計算前結構沒有進行 geometry optimization 的情況進行與上述相同的步驟,結果如圖 5 所示。有進行 geometry optimization 及沒有進行 geometry optimization 都各有 3 組不同的 U 的結果。

在調整 U parameter 時,我們發現 p 軌域的影響力比 s 軌域的大。另外,由圖 5 可知,當 s 軌域的 U parameter 變大時,會改變 conduction band 的形狀, Γ band 到 L 及 X band 之間皆會被拉低,而漸漸與 EPM 的結果不符。

接著,我們進行鍺錫 band structure 的模擬,錫的濃度我們取 3.125 % 6.25 %、 9.375 % 12.5 %以及 15.625 %。對於錫的濃度為 3.125 % 9.375 %以及 15.625 %, 我們建構一個內含 32 個純鍺原子的 supercell,並分別將 1、3、5 個鍺原子替換 成錫原子。另外,我們分別在鍺的 conventional cell 及 16 個純鍺原子的 supercell 中用錫原子替換一個鍺原子來模擬錫濃度為 6.25 %及 12.5 %的結構,見表 1。

在模擬 GeSn 時,我們採用跟純鍺一樣的 functional,GGA 中的 RPBE。U parameter 也是參照在純鍺時得到不錯的 band structure 結果的 U 值。在模擬完之後,我們對各個錫的濃度的 band structure 紀錄下其 Γ band(000)及 L band(111) 的能隙,所得結果如圖 6。



圖 5 鍺經由 GGA(RPBE)+U 計算出的 band structure, A(s=0.5 eV, p=1.3 eV)、B(s=3 eV, p=1.5 eV)、C(s=4.5 eV, p=1.65 eV),在計算前結構沒有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D(s=0 eV, p=1.15 eV)、E(s=1.5 eV, p=0.92 eV)、F(s=2.9 eV, p=0.8 eV),在計算前結構有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所有的 d=0 eV, f=0 eV, 且皆用 Scissors 把 Γ band(000)的能隙調到實驗值 0.8 eV。

表1 建構來模擬 Gel-xSnx 之晶體結構, x 包括 3.125 %、6.25 %、9.375 %、 12.5 %以及 15.625 %。其中,綠色小球代表鍺原子,灰色小球代表錫原子。





圖 6 不同錫濃度之鍺錫經由 GGA(RPBE)+U 計算出的 Γ band(000)及 L band(111)之能隙。(a) U parameter 為 s= 0.5 eV, p= 1.3 eV (b) U parameter 為 s= 3 eV, p= 1.5 eV, 在計算前結構沒有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

圖 6(a)(b)為不同的 U parameter 所得之結果,黑點為 Γ band(000)之能隙;紅點為 L band(111)之能隙。其中,我們一樣利用 Scissors 把純鍺的 Γ band(000)之 能隙調到實驗值 0.8 eV。至於 GeSn 的 Scissors,我們的取法如下:我們以 Γ band(000)為基準,設 GGA(RPBE)+ U 計算出純鍺的 Γ band(000)之能隙為 $E_{\Gamma,Ge}$, 則 Ge 的 Scissors, Scissors_{Ge}= 實驗值 0.8 eV- $E_{\Gamma,Ge}$ 。我們將 Scissors_{Ge}對 $E_{\Gamma,Ge}$ 的 比值 R (R= $\frac{Scissors_{Ge}}{E_{\Gamma,Ge}}$)固定。GeSn 的 Scissors, Scissors_{GeSn}即為 GGA(RPBE)+ U 計算出 GeSn 的 Γ band(000)之能隙*R, Scissors_{GeSn}= $E_{\Gamma,GeSn}$ *R。

我們可以從圖 6 觀察到不論是(a)或(b), Γ band(000)之能隙皆穩定的下降, 跟實驗值有相同的趨勢。而 L band(111)之能隙有跳動的現象,我們懷疑是因為 模擬的鍺錫結構大小不一樣,所以接下來我們把錫濃度為 6.25%及 12.5%的結構 都改為 32 個原子的 supercell。除了改變結構大小,我們還考慮到錫原子在 supercell 的位置不同可能也會導致計算出的能隙大小不同。因此,對於每個錫的 濃度,我們皆建構六種錫原子在不同位置的 supercell。模擬的結果如圖 7,紅色 跟黑色的點分別為 Γ band(000)及 L band(111)模擬出之能隙值;紅色跟黑色的實 線則為兩者分別做線性回歸的結果,兩線相交於錫濃度為 2.9165%的位置,比實 驗值小。



圖 7 不同錫濃度之鍺錫經由 GGA(RPBE)+U 計算出的 Γ band(000)及 L band(111)之能隙。每個錫濃度都有六種錫原子在不同位置的 supercell, 且每 個 supercell 都包含 32 個原子。U parameter 為 s= 3 eV, p= 1.5 eV, 在計算前結構沒有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

我們可以從圖 7 觀察到,錫原子在 supercell 的位置不同的確會導致計算出 的能隙大小不同,且能隙的變異很大。之後,我們對結構進行 Geometry optimization,結果如圖 8。誤差的上下分別為六種結構中最大及最小的能隙值, 藍色與紫色的點為六種結構中,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 後系統能量最低的能 隙值。



圖 8 不同錫濃度之鍺錫經由 GGA(RPBE)+U計算出的 Γ band(000)及 L band(111) 之能隙。每個錫濃度都有六種錫原子在不同位置的 supercell,且每個 supercell 都包含 32 個原子。U parameter 為 s=0 eV, p= 1.15 eV,在計算前結構有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a) Scissors 以 Γ band(000)為基準 (b) Scissors 以 L band(111)為基準

從圖 8 我們可以推論出,經過 Geometry optimization, 六種結構的能隙值變 得較為接近。還有, L band(111)之能隙皆偏大。此外, Scissors 以 Γ band(000) 為基準取值的結果較佳。

三、問題描述與擬採用方法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探討鍺(錫)與 GeO₂、HfO₂、ZrO₂ 等高介電係數材料的 介面之缺陷。要達到此目的,我們將繼續把 GeSn 的 band structure 模擬到跟實驗 值接近。接著,一樣利用 CASTEP 模擬鍺(錫)與 GeO₂、HfO₂、ZrO₂等材料的介 面,探討不同氧化態的 Ge、Hf、Zr,也就是 Ge、Hf、Zr 上的懸浮鍵對於能態密 度(Density of State)位置的影響。

四、預期成效

在了解 Ge、Hf、Zr 上的懸浮鍵對於能態密度位置的影響後,我們預期能藉 此來解釋在鍺(錫)與 GeO₂、HfO₂、ZrO₂等材料的介面,存在於鍺(錫)能隙中不同 位置的能態的可能來源。藉此推測出鍺(錫)電晶體在製造上的瓶頸。

我們希望能把由第一原理得到的鍺(錫)之電子電洞等效質量及能態密度輸入 TCAD 來模擬鍺(錫)元件的電學特性。同時,製作鍺(錫)電晶體並進行實驗量測,比較模擬結果與實驗結果是否相符。

五、參考資料

 Suyog Gupta, Blanka Magyari-Kope, Yoshio Nishi, and Krishna C. Saraswat, "Achieving direct band gap in germanium through integration of Sn alloying and external strain", *J. Appl. Phys.*, no. 113, pp. 073707-1-073707-7, 2013.